



HAL
open science

拉丁美洲：处在战争的边缘？

Olivier Compagnon

► **To cite this version:**

Olivier Compagnon. 拉丁美洲：处在战争的边缘？. 1937-1947 战争世界, 1,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pp.382-409, 2025. <halshs-05335485>

HAL Id: halshs-05335485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5335485v1>

Submitted on 4 Nov 2025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HAL Authorization

第十四章

拉丁美洲：处在战争的边缘？

奥利维尔·康帕尼翁(Olivier Compagnon)

参考以下两个重大转折点，历史学家们传统上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并不能被视为20世纪拉丁美洲的重要时刻：一方面，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后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危机导致了大量的重大政治变革，产生出的所谓民粹主义政权一直“脍炙人口”：包括墨西哥总统拉扎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任期之内(1934—1940年)，以及巴西总统格图里奥·巴尔加斯(Getúlio Vargas)的“新国家”政府(l'Estado Novo)(1937—1945年)，或是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执政的那几年(1946—1955年)；另一方面，1959年的古巴革命引发了一场颠覆性和反颠覆性共存的斗争，一直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过渡。因此，位于美国南部和加勒比海域的二十来个国家和地区应该一直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或者说，只承担了轻微的后果。而这两次灾难性的战争在其他地区一直被视为深刻动荡的代名词。

然而，当我们把西班牙和葡萄牙前殖民地统合到20世纪上半叶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的新世界中，来考虑他们在移民、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紧密联系时，这种历史观就自然会让人产生困惑，并引发深刻的反思。尽管1914—1918年的拉丁美洲只是少数几个研究项目的主题，并且仍然是一片广阔的、有待开发的“荒地”^{[16][17][18][32][33][36]}，但学者们却也以整个地区为维度对1939—1945年拉丁美洲的历史进行过一些尝试性的总结^{[53][54]}，并发表了一些专题著作，以重现各个国家经历的独特性，从而有可能重新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格兰德河以南地区的影响。

如果说不管 1939 年 12 月在拉普拉塔河口发生的海战^[67]、加勒比海的零星冲突（以及 1943 年 5 月 15 日，在哈瓦那东北部，古巴巡逻艇 CS-13 击沉德国潜艇 U-176），甚至是数千名重新走上战场的志愿兵，拉丁美洲仍被视为处于战争中心的边缘的话，巴西为战争做出的贡献却不容小觑。自 1944 年以来，巴西加入同盟军并与之协同作战，从巴西派遣到欧洲的约 25000 名远征军在若昂·巴蒂斯塔·马斯卡雷尼亚斯·德·莫赖斯（João Baptista Mascarenhas de Moraes）将军的指挥下，加入了美军第九十二师，并积极投身到了意大利战场的最后战役中^{[45][78][79]}。规模小一点的话，墨西哥组建了一支由 30 名左右的飞行员组成的空军部队——第 201 中队。该中队于 1945 年夏与美国空军一起在菲律宾作战，尤其是参与了吕宋岛解放战争。这一做法引起墨西哥媒体的特别关注 [例如，1945 年 5 月 1 日，《怡东报》（*Excelsior*）报道《墨西哥第 201 中队抵达马尼拉》；以及 1945 年 8 月 16 日，《国家报》（*El Nacional*）刊登《第 201 中队庆祝抗击日军的胜利》]，并且从 1945 年开始，海梅·萨尔瓦多（Jaime Salvador）导演以此为主题，执导了一部名为《第 201 中队》（*Escuadrón 201*）的墨西哥电影。除了军事意义（通常是次要的）之外，拉丁美洲还具有其他层面的意义，即在一场新的全面战争中，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都代表着交战国战略原材料的仓库，并成为各交战国施加外交压力的对象。战争在欧洲爆发后，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倾注所有的外交和经济实力，以确保在面对轴心国势力时，美洲大陆能保持团结。

此外，所有国家的新闻界、知识产业和文化史也都证明了冲突的普遍存在是 1940—1945 年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影响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各个社会领域。青年作家豪尔赫·阿马多（Jorge Amado）在 1943 年 3 月的巴伊亚日报《公正报》（*O Imparcial*）上写道：“战争是当今社会的主要问题。”^①事实上，二战已成为所有拉美国家内部动荡的催化剂，但也是该地区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好时机，因此 1945 年的拉丁美洲与 30 年代对危险敬而远之的拉丁美洲有着根本的不同^{[84][91]}。这正是历史学家皮埃尔·查

① Jorge Amado, *Hora de guerra. 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vista de Bahia. Crônicas (1942 - 1944)*, São Paulo, Companhia das Letras, 2008, p. 84.

努 (Pierre Chaunu) 在战争结束仅三年后所指出的: “我们必须摆脱已经在心中根深蒂固的拉丁美洲的传统形象, 就像安德烈·西格弗里德 (André Siegfried) 在他的经典著作^①中所提到的: 拉丁美洲是 95% 至 99% 的原材料出口商, 65% 至 75% 的制成品进口商。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 这种情况可能会一直延续。”^②

1939—1941: 中立阶段

1939年9月初战争在欧洲的爆发, 并未使拉丁美洲的外交大使和舆论界感到惊讶。事实上, 从20年代开始, 人们就对国际联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自1918年以来, 该联盟确实凝聚了各国加速推动国家间协作的希望, 但这种永久和平的眼界似乎很快就陷入了一种怨恨的阴霾之中, 一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胜利者的欧洲中心主义论中遗留下来的怨恨, 以至于阿根廷自1920年国际联盟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和1926年的巴西会议之后便关上了该国的大门^{[23][26][30][34][35]}。在整个30年代, 危险系数的上升和紧张局势的加剧引发了人们的持续关注, 出版界也注意到, 在经历了1914—1918年的大规模战争之后, 已步入迟暮之年的欧洲注定要走向衰败, 这实在令人失望^③。在所有西班牙语美洲国家中 (也包括巴西在内), 西班牙内战导致不同意见的产生, 加剧了政治冲突, 并且在许多知识分子和外交官们看来, 这场战争将是一场大动乱的序幕^{[15][22][25][29]}。巴西驻罗马尼亚大使塞罗·德·弗雷塔斯·瓦莱 (Cyro de Freias Valle) 在《慕尼黑协定》签署后的第二天这样写道: “一战结束时对战争问题的清理所取得的成果, 以及1919年签订的各项条约的效力, 在停战20年后的今天还剩多少呢? 与1914年相比, 一些国家在地理划分上存在差异, 这就是现在来看唯一的影响。……国际联盟正在逐渐消亡, 它不再有雄心壮志去憧憬能奇迹般地拥有新力量, 来为其灿烂辉煌的志向做另外一种尝试。……”

① André Siegfried, *Amérique latine*, Paris, Armand Colin, 1934.

② «Le miracle économique de Volta Redonda», *Annales. é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 Vol. 3, n°4, 1948, p. 569.

③ 关于阿根廷的情况, 请参阅 Eduardo Mallea, *Nocturno europeo*, Buenos Aires, Sur, 1935.

哪里才是救赎？”^①

1939年上半年，瓦莱的同胞林道夫·科洛尔（Lindolfo Collor），一名流亡记者，在结束了从柏林到巴黎的欧洲旅程之后，也断定一场新的战争不可避免，并且其残忍程度将闻所未闻。同时，古巴作家路易斯·罗德里格斯·恩比尔（Luis Rodríguez Émbil，1879—1954）也指出：“这是战前欧洲（1914—1918年的一战）与战后欧洲之间的唯一区别：一战前的欧洲闭着眼睛进行战争；而现在似乎是睁着眼睛走向战争。”^②

在动荡的前夕，面对没有吸取过往经验教训的欧洲，许多拉丁美洲知识分子都将西半球（美洲）视为最后一片和平净土。尤其是自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5][11]}，拉丁美洲各国与美国的关系便以“大棒政策”和威吓政策为特征，这也是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推行门罗主义的必然结果，但随着所谓的“睦邻政策”的实施，二者之间的关系在30年代初发生巨大转变。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其任期接近尾声之际开始构思“睦邻政策”，该政策由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入主白宫之后正式提出，当时，“罗斯福新政”刚刚初具规模，美国政府不能像过去几十年一样雄心勃勃地为拉丁美洲政策提供资金。新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提到，必须在西半球建立起信任关系。而关系的转折点实际上直到1933年12月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举行的第七次泛美会议上才得以成型，会议在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在场下，通过了“任何国家均无权（也不允许有权）干涉别国内政或外交事务”的原则。

尽管一些人可能将“睦邻政策”视为“美好爱情”的开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段“强迫婚姻”，但该政策很快便得到落实，例如古巴于1934年5月将《普拉特修正案》从宪法中废除。同年8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也撤离海地。并且在白宫的倡议下，泛美洲国家和平维护会议于1936年

① «O epílogo de Munich», Centro de Pesquisa e Documentação de História Contemporânea do Brasil (Rio de Janeiro) -Arquivo Cyro de Freitas Valle (37.07.5) .

② Lindolfo Collor, Europa 1939, Rio de Janeiro, Emiel Editora, 1939; Comisión chilena de cooperación intelectual, Misión de América en el plano intelectual como factor de la paz, Santiago, Imprenta Universitaria, 1939, p. 10.

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虽然在这次会议上，阿根廷和美国代表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显现出来，但各与会国还是通过了一项关于重建、保护和维持和平的公约；公约中提到，只要任何一个美洲共和国的和平受到威胁，该地区所有政府都将联合部署和平的合作与团结战略。1938年12月，在利马举办的第八次泛美会议上重申了“面对任何可能威胁到美洲的干预势力或外国活动”时保持团结的原则，尽管阿根廷外交部部长何塞·马利亚·坎蒂洛（José María Cantilo）明确表示布宜诺斯艾利斯方面永远不会盲目屈服于华盛顿的意志^{[8][10][46][49]}。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阿根廷认为，每个美洲人都有其特别的相貌，必须在坚持美洲大陆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政策。……这意味着美洲大陆内部的团结不能排斥与其他大陆的团结，并且我们也不能无视发生在美洲大陆之外的事件^[38]。

最后，睦邻关系明显的体现之一就是美洲间文化合作的繁荣。1940年8月正式成立了“诸美洲共和国商业文化关系协调办公室”，1941年7月更名为“美洲国家间事务协调员办公室”（OCIAA），1945年3月再次更名为“美洲国家事务办公室”，直到次年被解散^[40]。但事实上，这一文化合作在欧洲的战事爆发前就已经播撒下了肥沃的种子，甚至很多拉美国家已经意识到文化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19][20][28]}。

在这种崭新的美洲国家关系背景下，战争在欧洲的爆发引发西半球国家完全一致的反应。一方面，所有国家都选择保持明确的中立立场，延续旧的门罗主义（该主义于1823年开创了对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各国也巩固了美洲面对潜在侵略时保持团结的机制。1939年9月至10月，第一次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在巴拿马举行，1940年7月法国战败之后，在哈瓦那召开第二次美洲各国外长会议，美洲各国政府都一再重申美洲领土的不可侵犯性，以及对该地区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袭击都将被视为对整个美洲大陆的侵略这一事实。此外，美洲各国正式向所有交战国宣告，根据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他们作为中立国所拥有的权利，并且将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和荷兰）在美洲的殖民地置于他们的临时保护之下，以避免冲突延伸至大西洋彼岸（美洲地区）^{[46][53][54][80]}。尽管阿根廷遵守所有决议，但仍然发出了许多不同的声音。首先，阿根廷建议将“中立”的概念替换为“非交战”；其次，阿方重申本国在福克兰

群岛（或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权利，以及，如若英国出于任何原因决定终止对该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将有意愿要求恢复行使主权。

从多方面来看，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在1939—1941年的中立态度，也是对所面临的复杂政治经济局势的一种实际回应。一方面，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便已取代英国成为除阿根廷外拉美的主要贸易和金融伙伴，在阿根廷，英国部分保留了其地位。1938年，美国吸收拉丁美洲31.5%的出口量，并占其进口量的35.8%，因此，在大萧条的背景下，“睦邻政策”也被普遍视为对拉丁美洲共同利益的合理管理。另一方面，德国在整个20—30年代大大强化了其贸易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拉丁美洲进口的17.1%来自德国，其出口的10.3%也运往德国^[1]。在南锥体三国和巴西，以及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德国已成为首要的经济伙伴，这使美国以及英国和法国都倍感担忧。自19世纪末以来，通过发挥本国侨民团体的影响力，德国在某些领域一直保持着积极的形象，例如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及法律哲学或科学界的发展。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对拉丁美洲的兴趣日益浓厚（1929年柏林的“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其任务在于对这样一片“最后的自由大陆”进行研究，从而对该地区有扎实的知识储备^[31]），而这一兴趣就表现在加强文化交流之上，尽管交流涉及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并且缺乏连贯性，但它仍能强化德国在拉美地区的存在感，并加速大西洋两岸人口的流动^[24]。从1933年开始，许多抱有反自由主义和反议会主义思想的拉丁美洲政治人物，将发展得“如火如荼”的纳粹主义变成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强堡垒，并成为希特勒的狂热拥护分子，当时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NSDAP）在多国都成立了子政党，柏林方面正在建立一个强大的情报网络，而这一网络的中枢就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意识到如若冲突从欧洲扩张到美洲，德国的情报机构将会带来威胁，美国方面从1940年开始相继发起几次反情报行动，以摧毁位于拉丁美洲，特别是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第三帝国（即纳粹德国）情报网络^[62]。但是，与同盟军的宣传活动经常带有的目的不同，德国的经济输出与纳粹主义的渗透并没有直接的机械联系，因为这两个过程所涉及的参与者往往大相径庭^[72]。战争前夕，各国首都的德国大使馆和公使馆都是纳粹宣传的接力站，他们部署了广泛的出版舆论手段，满腔热情地邀请当地的政治精英前

往德国参加纳粹党的年会^[14]。尽管意大利不能被看作是主要的经济体，但其法西斯主义仍多方收买人心，正如巴西普林尼奥·萨尔加多（Plínio Salgado）的统一主义运动^{[2][12]}这段历史所证实的那样；或者，从巴西“新国家”制度中的某些高层对墨索里尼所表现出来的同情中，也可以看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人心的征服^[4]。至于日本，第一批日本侨民于1908年到达巴西，并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紧密的团体，日本在巴西、巴拉圭和秘鲁的经济植入状况也相对良好。对于以上三个轴心国来说，拉丁美洲不仅是重要的原材料产地，而且也是“幸免于”欧洲殖民的地区，是发展轴心国经济、思想和文化影响力的潜在领域。

换句话说，1939年下半年爆发的战争体现了自由民主制和专制政权之间的斗争，而“拉丁美洲在战争期间一致倒向英国或法国”这一观点是有误的。在激烈的政治冲突的氛围中，中立有助于维持国家内部的和平（尤其是对于阿根廷和巴西），因为在战争期间，这些国家内部大批移民团体的存在具有威胁性，正如我们在1914—1918年所看到的那样^[27]，在此期间国家应对措施的建立过程整体上也仍未完成。这些特殊情况也解释了某些国家模棱两可的态度，例如格图里奥·巴尔加斯（Getúlio Vargas）的态度，他在巴拿马和哈瓦那会议上都参与到泛美主义运动中去，并以国家主权和一致性的名义对巴西的纳粹主义运动进行镇压^[43]，但其政府内部仍有一些纳粹主义的仰慕者，其中就包括军事部长尤里科·加斯帕·杜特拉（Eurico Gaspar Dutra）；此外，格图里奥·巴尔加斯在1940年6月11日的讲话中也表现出对轴心国明显的仁慈态度，他认为近期的事件并没有宣告“文明的终结，正如悲观主义者和资深保守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而是一个新时代纷繁而复杂的开端”^{①[45][56][57][57][80]}。墨西哥也存在类似的紧张局势：1940年12月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Manuel Ávila Camacho）担任共和国总统以来，明显支持西半球的防御以阻止冲突扩大至美洲，但也有人为前任总统卡德纳斯（Cárdenas）表示遗憾，卡德纳斯在1938年将其石油产业直截了当地国有化之前，曾试图通过将石油产业向轴心

① Getúlio Vargas, *A Nova Política do Brasil*, Vol. VII (29 de outubro de 1939 a 29 de junho de 1940), Rio de Janeiro, José Olympio, 1940.

国开放来取代英美等国对这一产业的占有^{[55][73][76][82]}。在战争初期这一局势不稳定的阶段，采取骑墙态度最终有助于维护宏伟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计划，该计划以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为载体，也部分取决于出口的良好态势。

1942年：拉丁美洲态度转变的开端

日本轰炸珍珠港事件受到媒体的广泛评论，很快政治和舆论界都将其视为拉美国家命运转变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一个重大突破，即其他拉美国家是否会为了捍卫美洲间的团结，紧随美国之后加入战争的问题（这种团结自欧洲的敌对行动爆发之初就不断得到巩固）。我们仅举两个例子，智利圣地亚哥的《信使报》（*Mercurio*）将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的头版都“献给了”这一猛烈的突袭：“日本……对美国宣战。”至于里约热内卢的《巴西日报》，其12月9日星期二的新闻标题为《武装冲突已经使三个大洲尸横遍野，仍在继续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自19世纪至20世纪的世纪之交以来，中美洲地区和加勒比世界便成为美国的后院（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古巴、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些国家和1917年4月至5月的做法一样，在1941年12月间一致宣布对轴心国发动战争，尽管当地的政治格局可能都还变幻莫测。正如哥斯达黎加总统拉斐尔·安赫尔·卡尔德隆·瓜迪亚（Rafael Ángel Calderón Guardia），是一位亲法派、社会改革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51]，而萨尔瓦多总统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将军却从未掩饰过对轴心国的好感，例如1938年，他曾任命德意志国防军的前军官埃伯哈特·博恩施泰特（Eberhardt Bohnstedt）为圣萨尔瓦多军事学校的校长。很快，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也纷纷以声援美国为名中断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但没有参与战争^{[53][54]}。

1942年1月15日至28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三次美洲国家外长会议，为美国提供了清点其在整个美洲大陆的盟友数量的机会。一方面，重申美洲团结的原则促使大多数国家随即断绝了与轴心国之间的关系。巴

西的情况就是如此，巴西外交部部长奥斯瓦尔多·阿拉纳（Oswaldo Aranha）尽管是巴尔加斯专制政府的一员，但他极力颂扬民主的不朽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好处，并在会议闭幕之日便将其决定传达给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代表。另一方面，此次会议要处理的其中一项事务是与战争有关的经济问题，并明确美国直至1945年对拉美地区的政策基调的条件：在1941年3月制定的《租赁法案》框架下，美国通过向拉美各国提供大规模财政援助，以换取各国加入战争与同盟国并肩作战，并且各国要加强战略物资的运送，保证会为了战争动员和建设而毫无保留地进行合作^{[53][54][80]}。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拉美地区的某些资源对于持久战来说至关重要，例如墨西哥的锌和汞，哥斯达黎加的大麻，哥伦比亚的铂，秘鲁的棉花，委内瑞拉的石油，巴西的橡胶、咖啡和糖，以及智利的铜；因此，美国认为尽可能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甚至是霸权是恰当的，哪怕会冒犯诸如英国之类的盟友^{[1][59]}。最后，里约会议也是调解1941年厄瓜多尔与秘鲁的边境冲突的好时机，从而不惜代价保持泛美和谐。会议唯一的障碍无疑来自智利和阿根廷，两国不但没有参加战争，甚至还拒绝与轴心国断绝关系的原则——最终，智利直到1943年才彻底断绝与轴心国的关系，而阿根廷则拖到了1944年^{[9][46][70]}。

在里约会议的影响下，1942年成为至关重要的一年，墨西哥和巴西分别于5月22日和8月22日宣布参战，而这一决定也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德军潜艇部队给两国造成的损害在舆论界引起广泛的反响，也是两国对德宣战的导火索，因为这威胁到国家的荣誉和主权：5月13日和20日，德军分别击沉墨西哥波特雷罗·德尔·利亚诺号（Potrero del Llano）和法伽·德·奥罗号（Faja de Oro）两艘油轮；5月12日巴西里拉指挥官号（Comandante Lira）油轮也遭德军袭击，直至8月另外12艘巴西潜艇也惨遭击沉。也正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在《租赁法案》以及有效参与战争的承诺背景下，美国早已开始的大量援助，对将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视为当务之急的各国政府而言至关重要。然而，自1848年尤其是美国吞并墨西哥北部领土以来，墨西哥与美国之间就一直存在紧张的冲突关系，这种冲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而此次墨西哥的参战也意味着与其外交传统的背离^{[21][53][55]}。1942年加入盟军阵营，也意味着墨西哥重

新融入自1910年革命以来就已被大肆驱逐的国际社会（此外，墨西哥也因此赢得交战国的关注，例如维希法国和自由法国都用尽手段，让墨西哥承认自己是唯一合法的法国政权）^[74]。相反，巴西加入同盟军阵营在一定程度上重返该国在1917年10月所选择的道路，是一种与美国结成战略联盟策略的延续。该策略由外交部部长里奥·布兰科（Rio Branco）^①在20世纪初确立^{[45][56][77]}。在巴西的全力支持下，美国得以在巴西东北部海岸部署军事基地——纳塔尔市建立美国空军在美国领土以外的最大基地，累西腓市成为美国海军第四舰队的军事基地，在控制南大西洋和通往北非的海上航线命脉的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群岛（Fernando de Noronha）上也是如此。

1943年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加入战争之后^{[37][53]}，南美其他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和委内瑞拉）也根据形势的转变于1945年加入同盟国阵营。为了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重塑新世界的美洲关系，1945年2月21日至3月8日在墨西哥举行了一次特别的美洲国家间会议；会议结束之际，美洲各国签署了《查普尔特佩克公约》，提示那些尚未参战的拉美国家可以对轴心国宣战，从而能够以创始国的身份加入联合国。这次会议奠定了《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1947年）以及美洲国家组织（1948年）的基础，并且积极寻求建立新的区域经济秩序（即使最后徒劳无功），但该会议也敲响了“睦邻政策”的丧钟，因为会后建立了对违反新原则的美洲国家的制裁机制——换句话说，这一机制是美国的一种新的干预主义，其中战后最著名的干预行为之一就是美国于1954年6月推翻了危地马拉总统雅各布·阿本兹（Jacobo Arbenz）的统治^{[10][85][92]}。但是，与会的大多数国家在里约会议之后，都表现出对同盟国非常亲切的中立态度，并遵守“睦邻政策”下保持团结的承诺。曼努埃尔·普拉多·乌加泰奇（Manuel Prado Ugarteche），1939年至1945年间担任秘鲁共和国总统，于1942年1月起断绝与轴心国的外交关系并在港口城市塔拉拉（Talara）附近建立美国空军基地，源源不断地为美国输送原材料，参与控

① 关于巴西参战的许多外交资料都收集在战争结束前不久出版的文件集中：《巴西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约热内卢：国家报/外交部，1944年。

制和保护巴拿马运河的行动，直到1945年2月12日最终加入战争。尽管智利和巴拉圭曾被美国划分为拉丁美洲最亲德的国家，但两国仍通过部分镇压国内纳粹主义活动，以及参与美国要求的经济建设来表现其合作诚意，以此换取美方的金融资助^{[46][53][54]}。

因此，在这种局势下，阿根廷显然成了例外，如果不将战争的局势与其长期保持的逻辑结合起来，就无法理解阿根廷的做法。自19世纪末以来，阿根廷就对美国的扩张主义嗤之以鼻，因此尽管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该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仍然保持中立^[36]，并且致力于打消美国“领导”拉美地区的野心，即使巴西一直在助长美国的这一欲望。然而到了1930年9月，在阿根廷激进党的主持下实现了14年的真正民主之后，一个专制而保守的政权在政变之后上台，该政权内部许多政治精英都毫不掩饰对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狂热，这股热情就如同以往的反英情绪，特别是涉及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议之时。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孕育出的威权民族主义辐射到当时阿根廷的政治文化，并将民族独立的思想推上了顶峰^[17]。这些要素都解释了一个事实，即阿根廷的外交并没有完全融入20世纪30—40年之交的泛美祥和气氛之中，即使该国参加了这期间的所有会议，包括1942年的里约会议。次年，一次新的政变使军人上台执政，其中很大一部分官员都支持纳粹德国，并有意与所有交战国保持良好关系，以维护其出口市场。德国情报部门在“玻利瓦尔”行动（这是战争期间德国在拉丁美洲部署的所有间谍行动的代号^[62]）的框架内，拥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完全行动自由，这一事实也被作为阿根廷向轴心国献殷勤的证据之一，或者至少意味着阿根廷不会完全投入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个。1944年1月，在战争趋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之时，佩德罗·帕布洛·拉米雷斯（Pedro P. Ramírez）将军与德国和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但他在两个月后就被埃德尔米罗·朱利安·法雷尔（Edelmiro J. Farrell）将军免去了职务，后者是一名坚定的中立主义者。他重新审视过去几个月的发展态势，并再次与美国保持距离。在这样一种不欺瞒任何人的实用主义之下，阿根廷直到墨西哥会议之后才最终屈服，于1945年3月27日参战，尽管这次会议阿方并没有参与（这也是阿根廷被排除在拉丁美洲地区事务之外的证据）。即使人们并未指责不久之后由庇隆领导的1943年革命政体，但这

种极端的中立主义也同样给阿根廷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使阿根廷失去了同盟国的经济协助，而其邻国，尤其是巴西，却都大大受益于这一援助^{[9][42][44][46][70][71]}。

战争期间的经济增长

尽管交战国的经济转型和贸易流通的失调给拉丁美洲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整个地区来说确实是重要的增长契机。1939年至1945年间，拉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3.4%，出口总值增长10.5%，尽管跨大西洋贸易的困难和欧洲市场的准入限制，使得出口总量几乎停滞不前（仅增长0.5%）。从1942年开始，美国及其盟国以高价购买农业或矿物原料，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及大量外汇储备的创造做出决定性贡献。贸易版图的突然改组使得拉丁美洲淡化了与欧洲的伙伴关系，而进一步强化了对美国的依赖，并刺激了拉丁美洲的内部贸易：1938年拉丁美洲地区间的出口仅占6.1%，而1945年达到了22.4%。除了这一整体情况，一些区域性的细微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除巴拿马以外（巴拿马运河使其贸易量增加），以香蕉等非战略性农产品的出口为基础的中美洲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背景下获得的惠益比其他地区要少，甚至于，哥斯达黎加成为二战期间拉丁美洲唯一一个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国家；阿根廷、智利和巴拉圭，这些在战争中一度被认为支持纳粹的国家，也因此不被视为优先的合作伙伴，在战争期间也获益较少，即使后期向美国看齐也未能保障其经济的增长^[1]。

根据拉美国家的外交态度及其所代表的战略利益，美国不仅转变贸易流向，还改变其差别投资的格局。当时，巴西一直是《租赁法案》下受益最多的国家，仅一国就吸收了美国投入拉美地区资金的近3/4。巴西和美国在30年代末已经开始显现出双边经济靠拢的趋势，此时作为这一趋势的延续，巴西的参战及其东北部美国军事基地的建立，更促使巴尔加斯就“在里约热内卢州的沃尔塔雷东达建造钢铁厂”一事与美国商谈协议。1942年底，莫里斯·利韦林·库克（Morris Llewellyn Cooke）带领一个技术小组访问巴西，并给出一系列建议，旨在让巴西能最有效地满足战争背

景下美国的要求，同时也为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和某些经济领域彻底的现代化。此外，美国还在墨西哥投入大量资本，并紧急派遣了技术人员促进当地采矿业的现代化。在厄瓜多尔，美国的投资用以换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建立空军基地的权力。另外，美国也在秘鲁、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投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巴拿马运河得到保护。如果说美国在哥伦比亚或哥斯达黎加等地的投资主要是用于军队的现代化，那么其他资本的投入便主要指向工业的发展；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工业已成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也成为对19世纪以来甚至是殖民时代以来流行的食利模式的一种质疑。换句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拉丁美洲经济史上的重要时刻，因为战争为进口替代的过程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一些政府也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条件。尽管阿根廷和智利并非优先受益于北美洲资本的国家，但两国也经历了重要的工业化阶段，并加强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巴西和墨西哥也是如此^{[1][51][56][69]}。

然而，在泛美共同体的内部，不平等的待遇和没有兑现的承诺也引起紧张和不满。从1943年6月起，拉米雷斯将军领导下的阿根廷政府便开始担心美国对其对手巴西的慷慨解囊——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他在被法雷尔将军推翻之前曾与同盟国短暂和解^{[44][70]}。秘鲁曾在1942年里约会议上巧妙地进行过谈判，以期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解决与厄瓜多尔之间的边界争端；而智利认为自己破坏了秘鲁与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担心有一天秘鲁会故技重演，来解决与智利之间因太平洋战争（1879—1884）而产生的领土争端。1933年蒙得维的亚会议上关于加速建设“泛美公路”的决定一经宣布，中美洲的精英们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美国认为在一场涉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争中，此项工程对于捍卫拉美地区和巴拿马运河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然而，随着西半球上的威胁逐渐减少，该项工程也就突然被搁置，精英们以往的热情也被一种气恼的情绪所取代^[53]。即使在巴西，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许多批评也都指向库克的技术小组，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在此设想的大多数项目永远都不会实现^[57]。但是，这些美中不足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拉丁美洲悠久的经济发展史上，代表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阶段。

交战诸国的社会状况

战争不仅给拉丁美洲造成外交和经济上的后果，也使整个拉美社会以多种方式受到影响，甚至被动员起来，尽管他们与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相距甚远。就像在1914—1918年，拉丁美洲首先出现了强劲的通货膨胀趋势，特别是美元价格的上涨和制成品进口的稀缺，进而影响到了大众的生活——尽管城市遭受的影响比农村更大。1939—1945年间，拉丁美洲的商品零售价格平均每年增长12.6%，其中玻利维亚、洪都拉斯以及尼加拉瓜的零售价格平均年增长达20%以上。在巴西的纳塔尔市，记者兼律师的韦里西莫·德·梅洛（Veríssimo de Melo）经常在其为《日记》（*O Diário*）日报撰写的专栏中抱怨牛排的短缺或啤酒价格的上涨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65]。随着战争逐渐陷入僵局，所有国家的类似论断都在不断涌现。

为了防止不满情绪的积淀，一些国家的政府实施价格控制政策，有时求助于美国物价管理局^[1]。但是，这些措施既没能成功地控制生活成本的上升，也没有成功抑制社会运动的浪潮，尤其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这些运动变得特别频繁，并且经常遭到残酷镇压。特别是在巴西，巴尔加斯总统以1942年8月的参战为契机，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和稳固国防的双重需求为名，使劳动法变得极为严苛：在工厂，缺勤将被视为军队中的潜逃，罢工即为叛变，不遵守规定的工人将受到军事法庭法律的制裁，从而使劳动关系军事化，进而加强“新国家”政府的专制^[45]。阿维拉·卡马乔（Ávila Camacho）总统领导下的墨西哥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态势，政府不仅将宪法保障缩小到了战时状态，还要求有效建立义务兵役制度，引发了多方不满^[41]，至少对于拉丁美洲这两个威权政府来说，以支持美国和奉行自由民主为名义进行的战争是加强社会控制和镇压社会运动的机会。

不仅仅是社会运动，来自轴心国的、或多或少新近定居在拉丁美洲的移民团体也成为这种压制性紧张局势下的首要打击对象，尤其是他们进行政治活动时。自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便像斗牛士一样不断挥舞着第五纵队的“红布”，并对其美洲邻国施加特别压力，以驱逐隐藏在美洲国家内部的敌人。从1942年开始，那些已经选择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加强对移民

团体的镇压，并且将居住在拉丁美洲的至少 4058 名德国人、2264 名日本人和 288 名意大利人流放（有时是任意的）或拘留于美国^{[39][47][48]}；有些则被撇在一边、被没收财产或被监禁于定居的国家而没有被转移到美国^[66]；最后，其他人则选择逃往像阿根廷这种政策更为宽松的地方或者寻求保护，例如一部分定居在哥伦比亚的日裔移民，则选择利用西班牙驻波哥大大使馆对他们的同情来使自己置于其保护之下^[52]。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战争是推进拉丁美洲先前已经启动的、将外国人“国民化”的政策的机会。正如巴西在 1917 年 10 月至 1918 年 11 月之间早已颁布了针对定居巴西的德国人（德裔移民团体，或是我们经常称作“巴西的德国佬”的移民）的第一批措施^[27]，1938 年“新国家”政府禁止出版外文报纸以及教授外语；但是直到巴西正式参战，这一举措才得到强化，例如，强制他们在巴西国境内使用出行许可证。但矛盾的是，对那些不受欧洲法西斯主义欢迎的人来说，对外裔人口普遍实行的强硬的公共政策，并没有妨碍他们将整个拉美次大陆视为整个战争中的一个和平避风港。正如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足迹所证明的那样，在世界各地流亡 8 年后，茨威格于 1941 年定居巴西，1942 年 2 月自杀身亡。他在巴西创作了著名的《巴西：未来之国》（*Brasilien. Ein Land der Zukunft*），勾勒了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原始的社会蓝图。总的来说，拉美各国政府对希望离开欧洲大陆的犹太人的政策非常含糊^{[50][58]}。

撇开轴心国的侨民不谈，定居在拉丁美洲的外国移民团体都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尽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尤其是 1870—1914 年和 1919—1929 年间）在大萧条期间突然中断^[6]。社区媒体广泛报道战争情况，无数移民团体在当地政府允许的范围内组织示威游行以支持他们的祖国，并进行募捐来帮助伤员或受害者家属。这种远距离的运动使战时信息在报纸和杂志上大量传播成为可能，并在大众传媒的地位巩固之初通过广播以及新闻视频广为流传，移民团体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冲突插曲：例如，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一战期间还保持着兄弟情谊，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却多次在公共场合互相中伤^[7]。

知识分子在叙述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一战相同，他们通常使用相同的论证手段将文明与野蛮、自由与军国主义对立

起来，其中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都支持同盟国，并且积极在报纸、会议和游行中发声。然而，在墨西哥，诸如极右派报纸《自由人》（*El Hombre Libre*）领导的运动也并未被孤立，他们怀着反美亲德的情绪反对墨西哥完全卷入战争^[41]。支持轴心国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大量存在于阿根廷、智利、巴拉圭或巴西南部，不仅是因为他们国内存在许多德裔移民，还因为以上地区的法西斯主义可能比其他地区发展得更好^①。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有时数千名知识分子都是自愿参与到运动中去，并愿意为捍卫自己的理想而抛洒鲜血，而目前尚无法确定确切的人数。战争期间，多数国家的公众舆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分子界的意见冲突则与公众舆论的观念冲突如出一辙。1942年5月墨西哥《时代报》（*Tiempo*）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第一次测验数据），在宣布参战之前，有59.3%的被调查者反对墨西哥参与战争，但81.6%的人认为有必要在5月22日之后支持爱国主义运动和国防建设^②。尽管在这一领域尚缺乏具体的研究，但所有国家的天平似乎早已向同盟军急剧倾斜^[53]。

战争凭借着其在媒体界的影响力及其经济影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在，并最终渗透到了文化实践领域。战争在1940—1945年间成为大众文化的中心主题：从流行歌曲到电影、青少年读物以及狂欢节——1943年在里约更名为“爱国主义狂欢节”。由巴西作家蒙特罗·洛巴托恩（Monteiro Lobatoen）于1940年出版的书名为《大小键》（*A chave do tamanho*）（圣保罗：巴西国家出版社）的儿童图书，此后再版多次。书中描绘了小艾米莉亚在处于战乱的年代里所经历的故事，尤其讲述了她与希特勒的滑稽对话。在许多国家，这部作品成了加速拉丁美洲“美国化”进程的工具，巴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61][81]}。事实上，至少在巴西东北部，随着同盟军在拉美地区的宣传活动（主要是美国）不断涌现，成千上万的北

① 见 Virgilio Filippo 神父在阿根廷出版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手册：《野蛮人的悲剧和文明人的喜剧——关于战争和阿根廷的防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布宜诺斯艾利斯：白名单出版社，1944年。

② 参阅文章《墨西哥应该参加战争吗？由〈时代报〉发起的第一次民众投票结果》，载《时代报》1942年5月22日，第3页。以及文章《墨西哥参战〈时代报〉统计的第一次民众投票结果》，载《时代报》1942年5月29日，第4页（Cruz Garcia）。

美士兵进驻巴西，为传播“美式生活”、口香糖，以及新的美国英文歌曲的价值做出了贡献。1943年1月，巴西总统巴尔加斯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纳塔尔市会面，目的是讨论巴西参与同盟国军事行动的具体举措，美国杂志《生活》(Life)将其描述为“冲向胜利的蹦床”(Trampoline to Victory)，因为此次会面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由美国人建设的第一条公路被称为“泛美公路”(Panama Road)。然而性产业的兴起则使得当局必须对交易性性关系进行卫生管理，卫生部门向城中女性“性工作者”发放“性爱护照”(pasaporte de amor)，并且迅速大量发放由美国生产的避孕产品^[65]。

“美国化”引起知识分子的激烈辩论，他们在这种新的时代氛围中看到了抓住现代性的机会，但同时也担心大众传统文化会随之消融。然而，“美国化”仍然在“美洲国家间事务协调员办公室”(OCIAA，以下简称“办公室”)的支持下通过报纸、广播和电影等方式传播。一方面，有利于同盟事业的报纸和杂志能够相对容易地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纸张支持，尽管这一时期的总体趋势是每一期报纸和杂志的开数和卷册都有所缩减。办公室还专门开设分管新闻出版部门，为1000多种常规出版物提供信息，这些出版物也因此或多或少地成为美国宣传的基点^①。另一方面，这类报纸还推出了一部名为《前进》(En marchas)的月刊，发行量达55万份。此外还发行了其他一些出版物，其中许多漫画作品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有利于塑造一种全新的有活力的文化。至于无线电广播，则通过北美短波电台制作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各种节目。20世纪20—30年代之交，拉丁美洲形成了共同的传媒系统，因此那些旨在为同盟事业服务的报纸、广播剧和音乐节目得以迅速传播，偶尔也借助拉丁美洲的艺术家的力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是北美两大广播电台，也致力于促进其广播节目在拉丁美洲的传播。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节目之一是亚历杨德罗·苏克斯·哈布拉(Alejandro Sux Habla)，该节目每周在全拉美地区播出3天，节目中这位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坚决拥护拉丁美洲

^① 战后出版的这部书刊详细记录了有关OCIAA的行动：美国美洲事务办公室，《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的历史》，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7年。

支持同盟国的承诺，并会花 15 分钟左右的时间讨论时事。最后，办公室的电影制作工作应该是最著名的，主要得益于 20 年代以来在拉丁美洲城市电影界的大量实践。一方面，迫于压力，需要将轴心国制作的电影作品驱逐出拉丁美洲影院，这一行动，除在阿根廷以外，都获得了成功。另一方面，通过直接从好莱坞制片厂输送影片，北美电影也大致垄断了拉美电影产业。在这一大繁荣时期，出现了包括华特·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动画《致候吾友》（1942），以及许多宣传短片，例如《美国陆军工程师加快了泛美公路的建设》。在此期间，办公室最终制定了一项合作政策，通过向各个项目注入资本以发展拉丁美洲的电影产业，并且“在与轴心国的战争期间，要以各种形式展现西半球的团结事业”，但只在墨西哥才真正成型。尽管办公室在战争结束后被废除，但它显然在拉丁美洲美国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一进程也表征着 20 世纪整个拉丁美洲的文化状况^{[40][60][63][68][75]}。

持续笼罩的战争阴影

1945 年 5 月和 9 月，德国和日本的相继投降，并不意味着拉丁美洲重返战前状态。尽管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为同盟国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但这一胜利首先仍被认为是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有助于多国反对专制主义者或政党的合法化^{[84][91]}。1944 年 10 月，危地马拉的一次军民政变推翻了豪尔赫·乌比科（Jorge Ubico）的政府，并建立了多元化和民主化政权。次年，胡安·何塞·阿尔瓦拉多（Juan José Alvarado）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在委内瑞拉，旧独裁者胡安·维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于 1935 年 12 月去世之后才开始民主开放进程，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专制飞地。因此，1945 年 10 月 18 日，另一次军民政变爆发，“1945—1948 年的三年民主”（trienio democrático）在史学上被认为是该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时期。而巴西对镇压性的“新国家”政策（l'Estado Novo）进行了几个月的改革（取消审查制度、大赦政治犯、制定立宪会议项目），却终归徒劳无功，最终巴尔加斯于 1945 年 10 月 29 日被罢免。在战争的余波中，几乎所有场合，至少在演讲中，都提出了民主的要求，而许多社会

运动也利用这一新环境来表达自己的声音。然而，战争结束时拉丁美洲政权运行的民主化，并不像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所描绘的那样完整而持久，后者于1946年2月24日通过投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尽管美国外交干预了这场选举活动。此外，美国甚至于1954年6月亲自推翻了危地马拉的民主制^[85]。

作为战胜国，拉丁美洲所有国家本应均被视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但是那些曾明确地表示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却在1945年之后比其他国家享有更有利的融入国际社会的条件，并最终能够在“文明宴会上”觅得一席之地——正如外交官兼作家阿尔丰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所说^①。此外，拉美诸国也只能占次要地位，从他们被排除在1944年8月至10月10日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之外就可以看出美国的态度：一旦轴心国的命运一望而知，美洲的团结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无论如何，阿根廷很快就看清了这一点。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阿根廷与华盛顿的关系一直很难恢复正常，杜鲁门政府则以加入“马歇尔计划”为借口引诱阿根廷为欧洲提供谷物，随后又撤回这一导向^[90]。哥伦比亚也是如此，在整个19世纪，该国或多或少都只是欧洲国家舞台上的配角，并且从来没有真正能够在国际联盟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参加了旧金山和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哥伦比亚于1946年当选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并向朝鲜派遣兵力，展现了一种国际关系包容性的新形式^[83]。在众多的战后会议中，许多拉丁美洲代表都积极参与到新宪章和条约的起草中去，以建立国际新秩序，特别是在人权领域，智利法学家埃尔南·圣克鲁斯·巴塞罗（Hernán Santa Cruz Barceló）在促进人们对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概念的认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也对1948年3月5日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成立“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89]。委员会总部设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该委员会都发挥着核心作用，为拉丁美洲在发展问题上提出了恰当的拉美式的方法。

实际上，就思想史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标志着对欧洲的幻灭感加

① Alfonso Reyes, «Nota sobre la inteligencia americana», Buenos Aires, Sur, n°24, septembre 1936, pp. 7 - 16.

深，这一幻灭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 1914—1918 年产生的^[17]。然而，对美国而言，从巩固美洲国家团结的政策到冷战时期的政策，这一转变只花了两年时间，然后又回到了残酷的干预主义政策^{[11][85]}，完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同样，1939—1945 年也可以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这一时期刺激了拉丁美洲特有的理论和范式的出现，包括经济上的依赖理论和哲学宗教领域的解放神学理论。到了 60 年代，也只是对这些理论稍加修改^{[3][13]}。

泛美主义的顶峰

显然，拉丁美洲并非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边缘，除非将其视为 20 世纪中叶的世界外围地区（虽然它明显不是），或是拒绝将其历史载入世界历史的框架内（虽然它也完全参与其中）。从地区的角度出发，1939—1945 年标志着泛美主义的高潮，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应该被置于更广的时间维度来思考：也就是 1933—1948 年，即睦邻政策的正式启动直到美洲国家组织的成立。这一时期还对应于拉美经济持续增长的阶段，其特征是实行了进口替代和工业化项目，以及文化上的日渐美国化，同时引起诸多身份认同问题。并且不容忽视的是，拉丁美洲各国的想法也不再统一，而是呈现出多样化，因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以相同的方式参与到战争中去，这具体取决于他们与美国联系的密切程度，以及其自然资源的性质和贸易的结构，或是由其国土内外籍移民团体的多少来决定。只有通过严格的比较才能重建每个国家经历的独特性，又不会忽略整个次大陆共有的强大力量。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说法是正确的，则还需进一步解释原因，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拉美社会来说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纪念对象，也不是 20 世纪拉美历史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篇章。巴西远征军的士兵从欧洲战场归来之时受到热烈欢迎，众多欢腾的民众也纷纷前来祝贺。但由于没有专门负责管理士兵退役事宜的机构，他们重新融入平常生活的过程十分艰难，并逐渐被人遗忘，即使如今在某些博物馆中有关于他们的记录：例如 1976 年建于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南卡希亚斯博物馆，以及

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堡，或在某些教科书中也描述了他们的英勇事迹^{[86][87][88]}，也难以弥补他们当年被遗忘的历史。关于这一时期的阿根廷，人们不是去了解导致其保持极端中立的深层原因（这种中立态度使阿根廷最终付出惨痛代价），而更偏向记住其是纳粹战争罪犯的避难所，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也于1960年5月的一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摩萨德特工逮捕。而我们如何理解拉美历史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缺失，一种可能是拉丁美洲国家仅仅付出了极小的鲜血的代价，这一事实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仅从各个国家的层面来看，我们书写当代历史（直到近年）的方式，单纯采取国家的角度，很少使用比较性方法，更是从来不具备全球视角，这一方式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缺失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战争结束之后的七十年，毫无疑问，关于拉丁美洲的研究领域仍值得大量考究。

【参考文献】

- [1] BULMER-THOMAS, Victor,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 CAVALARI, Rosa Maria Feiteiro, *Integralismo, Ideologia e organização de um partido de massa no Brasil, 1932 - 1937*, São Paulo, EDUSC, 1999.
- [3] DEVÉS VALDÉS, Eduardo, *El pensamiento latinoamericano en el siglo XX. Entre la modernización y la identidad*, Vol. 1: *Del Ariel de Rodó a la CEPAL, 1900 - 1950*, Buenos Aires, Editorial Biblos, 2000; Vol. 2: *Desde la CEPAL al neoliberalismo, 1950 - 1990*, Buenos Aires, Editorial Biblos, 2003.
- [4] FERREIRA, Jorge, NEVES DELGADO, Lucilia de Almeida (dir.), *O Brasil Republicano*, Vol. 2: *O tempo nacional-estatismo, do início da década de 1930 ao apogeu do Estado Novo*, Rio de Janeiro, Editora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2007.
- [5] LEONARD, Thomas M., *Encyclopedia of U. S. -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Thousand Oaks, Sage/CQ Press, 2012, Volumes 3.
- [6] MÖRNER, Magnus, *Aventureros y proletarios. Los emigrantes en Hispanoamérica*, Madrid, Mapfre, 1992.
- [7] PELOSI, Hebe, *Argentinos en Francia, Franceses en Argentina. Una biografía colectiva*, Buenos Aires, Edición Ciudad Argentina, 1999.

[8] SHEININ, David (dir.), *Beyond the Ideal. Pan Americanism in Inter-American Affair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9] SHEININ, David, *Argent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Alliance Contained*,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6.

[10] SMITH, Joseph,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A Histo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1776 – 20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1] SMITH, Peter H., *Talons of the Eagle. Latin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 TRINDADE, Hélió, *La Tentation fasciste au Brésil dans les années 1930*,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8.

[13] ZEA, Leopoldo, «Dependencia y liberación en la filosofía latinoamericana», *Diánoia*, Vol. 20, n°20, 1974, pp. 172 – 188.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14] BOSEMBERG, Luis E., «Alemania y Colombia, 1933 – 1939», *Iberoamerica*, Vol. VI, n°21, 2006, pp. 25 – 44.

[15] CERQUEIRA FILHO, Gisálio, NEDER, Gizlene, «Ecos da Segunda República e da Guerra Civil Espanhola no Brasil», *Tempo*, Vol. 4, n°8, 1999, pp. 89 – 109.

[16] COMPAGNON, Olivier, «Latin America», in WINTER, Jay (di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I: *Global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33 – 555.

[17] COMPAGNON, Olivier, *L'Adieu à l'Europe. L'Amérique latine et la Grande Guerre (Argentine et Brésil, 1914 – 1939)*, Paris, Fayard, coll. L'Épreuve de l'histoire, 2013.

[18] DEHNE, Phillip A., *On the Far Western Front. Britain's First World War in South Americ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 DUMONT, Juliette, FLÉCHET, Anaïs, «Pelo que é nosso! Naissance et développements de la diplomatie culturelle brésilienne au XX^e siècl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2009/1, pp. 61 – 75.

[20] DUMONT, Juliette, *De la coopération intellectuelle à la diplomatie cultusrelle. Les voies/x de l'Argentine, du Brésil et du Chili (1919 – 1946)*, thèse de doctorat en histoire, 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Paris 3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de l'Amérique latine), sous la direction de Laurent VIDAL, 2013, 2 Volumes.

[21] DURÁN, Esperanza, *Guerra y revolución. Las grandes potencias y México, 1914 –*

1918, Mexico, Colegio de México, 1985.

[22] FALCOFF, Mark, PIKE, Fredrick B. (dir.), *The Spanish Civil War. American Hemispheric Perspective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2.

[23] FISCHER, Thomas, *Die Souveränität der Schwachen. Lateinamerika und der Völkerbund, 1920 – 1936*,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2012.

[24] GOEBEL, Michael, «Decentring the German Spirit: the Weimar Republic's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44, n°2, 2009, pp. 221 – 245.

[25] GONZÁLEZ, R. Nicolau (dir.), *Cuba y la defensa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1936 – 1939)*, La Havane, Instituto para la Historia del Movimiento Comunista y de la Revolución Socialista de Cuba/Editora Política, 1981. /omulel movimiento Ce.

[26] LLAIRÓ, María Montserrat, SIEPE, Raimundo, *Argentina en Europa. Yrigoyen y la Sociedad de las Naciones (1918 – 1920)*, Buenos Aires, Macchi, 1997.

[27] LUEBKE, Frederick C., *Germans in Brazil.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Cultural Conflict during World War I*, Baton Rouge-Londre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8] PERNET, Corinne A., «Culture as Policy: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 the Interwar Period», *Puente@Europa*, Vol. 5, n°3/4, 2007, pp. 121 – 126.

[29] QUIJADA, Monica, *Aires de República, aires de cruzada.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en Argentina*, Barcelone, Sendai, 1991.

[30] RHENAN SEGURA, Jorge, *La Sociedad de las Naciones y la política centroamericana, 1919 – 1939*, San José, Euroamericana de Ediciones, 1993.

[31] RINKE Stefan, «Der letzte freie Kontinent», *Deutsche Lateinamerikapolitik im Zeichen transnationaler Beziehungen, 1918 – 1933*, Stuttgart, Hans Dieter Heinz, 1996, Volumes 2.

[32] TATO, María Inés, «La contienda europea en las calles porteñas. Manifestaciones cívicas y pasiones nacionales en torno de la Primera Guerra Mundial», in TATO, María Inés, CASTRO, Martín O. (dir.), *Del Centenario al peronismo. Dimensiones de la vida polític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Imago Mundi, 2010, pp. 33 – 63.

[33] TATO, María Inés, «Contra la corriente. Los intelectuales germanófilos argentinos frente a la Primera Guerra Mundial»,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Lateinamerikas/Anuario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Latina*, n°49, décembre 2012, pp. 205 – 224.

[34] VARGAS GARCIA, Eugênio, *O Brasil e a Liga das Nações (1919 – 1926)*, Porto Alegre,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Grande do Sul, 2000.

[35] WEHRLI, Yannick, «Latin America 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Bolivar's Dream come True?», in AUROL, Claude, HELG, Aline, *Latin America 1810 – 2010. Dreams and Legacies*, Londres,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12, pp. 67 – 82.

[36] WEINMANN, Ricardo, *Argentina en la Primera Guerra mundial. Neutralidad, transición política y continuismo económico*, Buenos Aires, Biblos/Fundación Simón Rodríguez, 1994.

关于拉丁美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37] BLASIER, Cole,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the Bolivian Revolutionaries (1941 – 1946)»,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2, n° 1, 1972, pp. 26 – 54.

[38] CONIL PAZ, Alberto, FERRARI, Gustavo, *Política exterior argentina, 1930 – 1962*, Buenos Aires, Editorial Huemul, 1964.

[39] CONNELL, Thomas, *America's Japanese Hostages. The World War II Plan for Japanese Free Latin America*,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40] CRAMER, Gisela, PRUTSCH, Ursula (dir.), *I Americas unidas! Nelson A. Rockefeller's Office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 (1940 – 1946)*, Madrid-Francfort-sur-le-Main, Iberoamericana Vervuert, 2012.

[41] CRUZ GARCÍA, Mauricio, «Gobierno y movimientos sociales mexicanos ante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Foro Internacional*, Vol. 51, n°3 (205), juillet-septembre 2011, pp. 458 – 504.

[42] DIÉGUEZ MARÍA, Isabe M., «La neutralidad de Argentina durante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22, n°85, janvier-mars 1989, pp. 53 – 77.

[43] DIETRICH, Ana Maria, *Caça às suásticas, O Partido Nazista em São Paulo sob a mira da polícia política*, São Paulo, FAPESP, 2007.

[44] ESCUDE, Carlos, «Un enigma: la “irracionalidad” argentina frente a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Estudios interdisciplinario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Vol. 6, n°2, juillet-décembre 1995, pp. 5 – 34.

[45] FERRAZ, Francisco Alves, *Os Brasileiros e 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Rio de Janeiro, Jorge Zahar Editor, 2005.

[46] FRANCIS, Michael J., *The Limits of Hegemony.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Ar-*

gentina and Chile during World War II,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7.

[47] FRIEDMAN, Max Paul, «Private Memory, Public Records, and Contested Terrain: Weighing Oral Testimony in the Deportation of Germans from Lat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27, n°1, hiver-printemps 2000, pp. 1 – 15.

[48] FRIEDMAN, Max Paul, *Nazis and Good Neighbours, The United States Campaign against the Germans of Latin America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9] GELLMAN, Irwin, *Good Neighbour Diplomacy. United States in Latin America, 1933 – 194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50] GLEIZER, Daniela, *El exilio incómodo. México y los refugiados judíos, Mexico*, El Colegio de México/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 Cuajimalpa, 2011.

[51] GÓLCHER, Erika,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Participación costarricense en la organización panamericana (1936 – 1944)», *Anuario de Estudios Centroamericanos*, Vol. 22, n°2, 1996, pp. 91 – 104.

[52] HERNANDEZ GARCÍA, José A. , «La colonia japonesa en Colombia durante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y la protección de sus intereses por la embajada española»,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n°36, 2008, pp. 143 – 162.

[53] HUMPHREYS, Robert A. , *Latin America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res, Athlone/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1: 1939 – 1942, 1981; Vol. 2: 1942 – 1945, 1982.

[54] LEONARD, Thomas M. , BRATZEL, John F. (dir.), *Lat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55] LOYOLA DIAZ, Rafael (dir.), *Entre la guerra y la estabilidad política. El México de los 40*, Mexico, CEMCA/Grijalbo, 1986.

[56] MCCANN, Frank D. , *The Brazilian-American Alliance (1937 – 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57] MCCANN, Frank D. , «Brazil and World War II : The Forgotten Ally. What did you do in the War, Zé Carioca?», *Estudios interdisciplinario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Vol. 6, n°2, juillet-décembre 1995, pp. 35 – 70.

[58] MILGRAM, Avraham, *Entre la aceptación y el rechazo. América Latina y los refugiados judíos del nazismo*, Jérusalem, Yad Vashem, 2003.

[59] MILLS, Thomas C. , *Post-War Planning on the Periphery. Anglo-American Eco-*

conomic Diplomacy in South America, 1939 - 1945, Édimbourg,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60] MONTOYA CÁRDENAS, John Jairo, *La propaganda estadounidense en la radio colombiana durante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tesis de grado, Université nationale de Colombie, Bogota, 2009.

[61] MOURA Gerson, *Tio Sam Chega ao Brasil. Apenetraçao cultural americana*, São Paulo, Brasiliense, 1993.

[62] MOWRY, David P., *Cryptologic Aspects of Germa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in South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Center for Cryptologic History,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2011.

[63] OJEDA Mario, «La propaganda norteamericana en América Latina; la Segunda Guerre Mundial», *Diálogos: Artes, Letras, Ciencias humanas*, Vol. 12, n° 5, septembre-octobre 1976, pp. 5 - 6.

[64] ORTIZ GARZA, José Luis, *Ideas en tormenta. La opinión pública en México y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Naucalpan, Ediciones Ruz, 2007.

[65] PEDREIRA, Flávia de Sá, *Chiclete eu misturo con banana. Carnaval e cotidiano de guerra em Natal (1920 - 1945)*, Natal, Editora da UFRN, 2005.

[66] PERAZZO, Priscila Ferreira, *Prisioneiros da guerra. Os «Suditos» nos campos de concentraçao (1942 - 1945)*, São Paulo, Humanitas Imprensa Oficial, 2009.

[67] POPE, Dudley, *The Battle of the River Plate. The Hunt of the German Pocket Battleship Graf Spee*, Ithaca, McBooks Press, 2005.

[68] PURCELL, Fernando, «Cine, propaganda y el mundo de Disney en Chile durante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Historia*, Vol. 43, n°2, 2010, pp. 487 - 522.

[69] RANKIN, Monica A., *I México, la patria! Propaganda and produc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9.

[70] RAPOPORT, Mario, *Aliados o neutrales? Argentina frente a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Buenos Aires,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de Buenos Aires, 1988.

[71] RAPOPORT, Mario, «Argentina y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Mitos y realidades», *Estudios Interdisciplinario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Vol. 6, n°1, janvier-juin 1995, pp. 5 - 21.

[72] RAPOPORT, Mario, MUSACCHIO, Andrés, CONVERSE, Christel, «Las inversiones alemanas en Argentina entre 1933 y 1945. Base material de la expansión de los na-

zis?», *Iberoamericana*, Vol. VI, n°21, 2006, pp. 45 – 69.

[73] RODRÍGUEZ AVIÑOÁ, Pastora, «La prensa nacional frente a la intervencion de México en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Historia Mexicana*, Vol. 29, n° 114, octubre-décembre 1979, pp. 254 – 300.

[74] ROLLAND, Denis, *Vichy et le France libre au Mexique. Guerre, cultures et propagandes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Paris, L'Harmattan, 1990.

[75] SADLIER, Darlene J., *Americans All. Good Neighbor Cultural diplomacy in World War II*,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2.

[76] SALAZAR, Delia, FLORES, Eduardo, «Soldados mexicanos en el frente. México y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Historias*, n°40, avril-septembre 1998, pp. 83 – 101.

[77] SEITENFUS, Ricardo, *A entrada do Brasil n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Porto Alegre, EDIPUCRS, 2000.

[78] SILVEIRA, Joel, MITKE, Thassilo (dir.), *A Luta dos pracinhas. A FEB 50 anos depois: Uma visão crítica*, Rio de Janeiro, Record, 1993.

[79] SULLA, Giovanni, TROTA, Ezio, *Gli eroi venuti dal Brasile. Storia fotografica del corpo di spedizione brasiliano in Italia (1944 – 1945)*, Modène Il Fiorino. 2005.

[80] TEIXEIRA DA SILVA, Francisco Carlos, SCHURSTER, Karl, LAPSKY, Igor, CABRAL, Ricardo, FERRER, Jorge (dir.), *O Brasil e 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Rio de Janeiro, Editora Multifoco, 2010.

[81] TOTA, Antônio Pedro, *O imperialismo sedutor. A americanização do Brasil na época da segunda Guerra*, São Paulo, Companhia das Letras, 2000.

[82] VELÁZQUEZ FLORES, Rafael,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México durante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Mexico,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7.

关于战后时期

[83] BERMUDEZ TORRES, César A., «Inserción de Colombia en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n el contexto de la segunda postguerra mundial», *Civilizar. Ciencias sociales y humanas*, n°19, janvier-juin 2010, pp. 135 – 152.

[84] BETHELL, Leslie, ROXBOROUGH, Ian (dir.), *Latin America betwee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Cold War. Crisis and Containment, 1944 – 194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85] BRANDS, Hal., *Latin America's Cold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86] FERRAZ, Francisco Alves, «Os livros didáticos e a participação brasileira n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Luso-Brazilian Review*, Vol. 4, n°1, juin 2010, pp. 11 – 39.

[87] FERRAZ, Francisco Alves, *A guerra que não acabou. A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s veteranos da força expedicionária brasileira (1945 – 2000)*, Londrina,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Estadual de Londrina, 2012.

[88] GUIMARÃES, Virgínia, *Ex-Combatentes do Brasil. Entre a história e a Memória*, Rio de Janeiro, Multifoco, 2010.

[89] PERNET, Corinne A. , «Shifting Position to the Global South: Latin America's Initiatives in the Early Years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AUROI, Claude, HELG, Aline (dir.), *Latin America, 1810 – 2010. Legacies and Dreams*, Londres,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12, pp. 83 – 99.

[90] RAPOPORT, Mario, SPIEGEL, Claudio, «La Argentina y el Plan Marshall: Promesas y realidades»,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Vol. 52, n° 1, 2009, pp. 5 – 28.

[91] ROCK, David (dir.), *Latin America in the 40's. War and Postwar Trans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92] ROSS, César, «La carta económica de las Américas, 1945: EL disenso de Chapultepec»,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n°8, second semestre 2012, pp. 57 – 82.